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二八期 ——
(二〇〇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302c)

【亡灵祭坛】一封信和一个人之死	向继东
【前事不忘】只有先知道，才能不忘记	吕大渝
【史海钩沉】红卫兵领袖政治哲学的一个范例	木 华
【学术争鸣】文化革命中造反运动及造反派之评析 (二之一)	
——为文革三十五周年而作	刘国凯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亡灵祭坛】

一封信和一个人之死

• 向继东 •

“历史不会重演，但错误是会重演的”（陈独秀语）。但愿这篇小文能唤醒人们对历史的记忆。——题记

近几年来，我对故去的现当代人物发生了兴趣，且不管是有名或无名的，革命或不革命的，只要我觉得有思考的价值和意义。

前不久，我读一篇《能否为张志新拍一部电影》（载《湘声报》2001年8月10日三版），颇有所感。一方面，觉得张志新已追认为烈士了，拍片反映烈士生平，无可非议；至今未有艺术家去拍，当然是个遗憾。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张志新们（包括遇罗克、林昭、李九莲等）还算幸运，冤死几年后，时局一变，平反了，有的追封“烈士”称号，有的说是“无罪错杀”，且媒体都有不同程度的报导，林昭和遇罗克还出版有纪念专辑。但应该承认，还有不少像张志新们一样冤死的人，至今未为人知，其中武文俊就是一个。

说起来，我与武文俊同乡，同是湘西溆浦人。那时，武文俊在该县低庄公社杨和坪大队小学当公办教师，我在与低庄相邻的双井公社宝塔小学当民办教师。我们彼此并不相识，只是这个案子破获后，我才知道有个叫“武文俊”的人（破案时，每人上交一个笔记本，还要另写一张纸的字，弄得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心怕笔迹错对到自己头上说不清）。1977年1月9日上午，武文俊因“现行反革命罪”被枪杀在县城对河的沙坑里，时年40岁。所谓“现行反革命罪”，就因为他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写了一封匿名信。关于匿名信的内容，当时只听说它“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提出了“重新建党建国建军十大纲领”。

恢复高考后，我离开了湘西，但与文字结缘，每每读到关于张志新、关于遇罗克、关于林昭和李九莲的文字时，总觉得应该为武文俊写点什么。

武文俊蒙冤25年后，我又踏上那块土地，武文俊的妻子刘满英流着泪对我说：“他本来最胆小怕事的，也不管闲事的，教书回来，要么帮着做点家务，要么就在木楼上读他的书。那次，他也是鬼迷住了……”与武文俊一起任教杨和坪小学的同村人武思月说：“武文俊是个好人。他善良，从不与人争吵，做事都考三虑四的。还有，他胆子小，出点事就吓死了。他还比较孤僻，有书呆子气，书读得多，社会上的事也想得多，但平时开会讨论什么，大家七嘴八舌，他不吱声的。到出事时，我们都不相信那信会是他写的。”

武文俊的“匿名信”是1976年4月12日开始酝酿起草，4月22日写成的。4月24日从溆浦县城投邮。3个月后，即7月25日夜武文俊被捕。经过167天的审理，武文俊就被枪杀了。1977年1月4日溆浦县人民法院下达死刑判决书称：“武犯自1958年参加教师工作后，资产阶级思想极为严重，经常发泄不满言论，曾受到学区重点批判，但仍不思悔改，发展到仇视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思想极为反动。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书写了一封3000余字的反革命匿名信，1976年4月24日投寄‘国务院总理亲收’。利用古今中外最恶毒的语言，极其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攻击我们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华主席，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反革命气焰极其嚣张，罪行严重，民愤极大。本院为了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战线，保卫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卫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深入发展，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坚决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特依法（没有说根据某款某条，引者注）判处武犯文俊死刑，立即执行。”

判决书最后称“如不服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3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但据查案卷记录，武文俊没有上诉，倒是他的亲人于3年后开始上诉，要求复查此案。1982年5月18日，怀化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武文俊属“有罪错杀”。鉴于其家庭生活困难，特给予其家属生活补助费800元——这就是事件的结局了。

武文俊在那封赔上性命的“匿名信”中到底写了些什么呢？现摘录如下：

※ ※ ※ ※ ※ ※

十化宗主阁下：

上次来函，想必一定收到，此事宜早图之，愈快愈好，迟则有变，反害自身，则祸必临头耳！须知，熊精特性，最善蛊惑人心，笼络人心，软化人心，熊乃丁火所化，即是最坚硬的金属，亦能被软化，他迎人则抓住不放，笑不休，笑后则吃人。它所宠信的人，也可说是最倒霉的人。曾有熊精的故事，说人熊感受宇宙阴阳之气，变化成精，能托胎于人，又能借尸还魂，世人不识。它宣扬专替人民办好事，骗得多人信服，好认人作亲属朋友，但一旦真正与它亲密

接触，就会被它吃掉。它自谓穷通宇宙哲理，有通天之术，可以引导人民进入“天堂”，骗得五湖四海人们的信任。于是它把舌头伸出，变成了一座“天桥”，指挥人们上“天桥”，进入“天堂”，于是人们受骗，没有认清本质，不识真伪，人们络绎不绝竟不辞劳苦地披星戴月地忍饥挨饿地上“天桥”，岂知有去无归。原来“天堂”是个死胡同，都进入了熊精的咽喉，被吞吃。眼看人民就会遭受灭族之祸。幸好，天帝知道了此事，即降贤士于人间。贤士拔剑斩精，才拯救了人们。

〔引者按：武文俊在狱中交待说：称呼“十化”，即“华”字分拆，指华国锋；“宗主”，武说是奴隶社会的头人；“上次来函”系虚构，意在增加破案难度；“熊精”二字共28画，是影射毛泽东；“熊精的故事”是根据民间“莽蛇精的故事”改编的。“贤士拔剑斩精”，是指1976年4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闹事的反革命分子”，“精”即“熊精”。〕

历史到了现代，熊精又借尸还魂了，它不断地把宠信的人做为梯子，踏着梯子使它可以不断上升。做梯子者，自然是被践踏者。最初还以为是荣幸，认为地位提高了，其实是个梦中牺牲者。曹操好梦中杀人，实际操刀不在梦中，被杀者在梦中也。还是那句老俗语，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得宠应当思辱，居安应当虑危，上台之时，须考虑下台之日。现在既做了它足下之梯，那就不能不认真对付，无能无为，会被踏碎，有偏有倚，亦会踏扁，须知熊精变化多端，要人倒地，鬼神莫测，若稍有不慎，就会遭险。它打着“为人民服务”旗号，挂着“为人民造福”的牌子，骗取了五湖四海的人信任之后，因而也就有了杀人之权，置人于死地，只要一句话。经常思考着杀人之术，治人之道，整人之法，竭力煽动鼓励人们之间斗争，说是阶级斗争，使人们自己打自己，自己消灭自己，这就是它经常宣扬的“斗争哲学”，也是它全部学说的宗旨。所谓革命，按照它的打算，先革有产者之命，后革无产者之命，一时运用这股力量，打倒一方，一时运用那股力量打倒另一方，以逐步达到消灭人民之目的，确实没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够与它共事始终。不主张公理、正道，惟我独尊，至高无上，毁灭人类文明、自由、民主幸福，实行野蛮、残暴、灭绝人性的社会奴隶主义制度，它是真正的拉历史倒车，使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到万恶的社会奴隶主义制度（林说它是社会封建主义，这种说法不当）。

〔引者按：文革后，中央拨乱反正，立即修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实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方略。〕

下面只简举数例，证明它不如封建社会进步，而是倒退到奴隶社会去了。

一、经济不如封建社会富裕，外面光华，内部空虚，国家和人民都很贫困。就拿农民的劳动和收入来说，现在农民一年360天，天天劳动，起早摸黑，比封建社会给地主做长工辛苦得多，可是收入很少，只能维持半饱的生活，吃自己的饭，每个劳动日的工资不到一升大米，与奴隶生活水平差不多。以前给地主打长工，一日三餐饭是吃地主家的，有时还有点酒肉荤菜，每月工资两担稻谷，一年就有24担稻谷余着，折合市斤就有两千多斤。打零工是每日工资3到5升大米，一天三餐饭还是吃主人家的。插田打禾时的零工工资，每天可达一斗五升左右的稻谷，三餐饭是吃主人的。手工业每天工资有5到8升大米，一日三餐吃主人的。其他行业人员的工资就更不用说了，要比农民高得多。封建社会人们的劳动量又没有现在这么大，劳动时间没有这么多，种植面积也不及现在的一半。“杨立贝、白毛女、祥林嫂”毕竟还是加了浪漫色彩的创作小说，不是真人真事。当然不能否认以前的封建社会有弱点。但是现在不许写阴暗面，若允许写的话，又何止千万个比祥林嫂、白毛女更惨的人呢？这证明现代社会不如封建社会，是奴隶社会。

二、关于妇女的“解放”，若说妇女现在得到了“解放”，不如说是用绳子把妇女穿了鼻栓。看农村妇女，除了负担家务劳动外，又还要参加田间劳动，妇女的劳动量、劳动时间超过了男

人，变成了女奴隶。以前说妇女整天绕着锅灶转，没有得到解放，现在才是“解放”了，劳累得要死。又说老人和儿童“解放”了，不看别的地方，就看大寨的老年和儿童就知道，一个个都被整弯了腰。当然，要人民劳动并不错，不过，所付出的劳力和所得的收入，对比一下，不及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差不多。

三、人民没有政治地位，连买个东西也要讲情面，讲人熟。没有政治权力，没有言论自由。特别是学术界，不能发挥才能，都被认为是毒草，要进行批判，于是没有人敢写书了，只有熊精的邪说独盛，盈柜满架。这种奴隶主义社会，阻碍了人们的思想进步和学术的发展。

四、一切人的行动都不自由。就是当官的也不见得比老百姓自由多少，都被当做奴隶一样管得死死的。利用奴隶管奴隶，这是一种巧妙的奴隶制度，人们都成了奴隶。在封建社会人们的行动还比较自由。

五、职业不自由，不能由自己选择职业。人身不自由，处处有约束，连劳动生产都不自由（反对生产自由种植，反对劳力自由支配），生活不自由，生存不自由，生育不自由（要把生有两、三个以上小孩的二、三十岁的男女青年，强迫实行阉割结扎生殖器）。它没有后代，痛恨人民有后代，要减少人口，实行截代灭种之法，完全把人民当作牲畜，侮辱残害，明杀人，暗杀人，数目之多，无可统计。

六、徭役赋税之多，史无前例。征收公粮，按单位面积计算，比封建社会所交公粮多十几倍到二十倍；按总斤额计算，比封建社会多40倍左右。与农民以前给地主交的租谷差不多（每亩田土交稻谷200斤左右）。“收租院”是演的现实，不是演的历史。各种税收繁多，什么都要交税，真是熊精“万税”，人们常常喊“万税，万万税”！还有其他派购、统购、徭役、义务工、积累工等等，人民总负担量，超过封建社会若干倍，农民贫困，又不许搞点副业收入，说是资本主义道路，要退赔，要批判，真是连吃盐的钱也没有。农村忙碌不休而生活苦，城市萧条而颓废，工人生活水平亦不高。

七、专门吹嘘成绩，鼓吹这种社会奴隶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不承认自己的缺点错误，59年到61年那一阶段更苦，确实饿死不少人。可是把错误加到别人头上，说是苏修掐我们的脖子，要我们还债，又说是刘少奇路线搞的，又说是下面干部的“五风”，又说是天老爷不下雨。就不承认自己有错。报刊广播，都是讲的“大好形势，而且越来越好”，从来没有讲过半点缺点错误，使人们看透了这种虚伪的实质，因而产生反感，都不相信。它否认了一切学术思想，独尊熊精的思想和个人的主义，完全违背了人民的意志愿望。

以上只是随便略举数例，说明熊精的倒行逆施，由封建社会复辟倒退到奴隶主义制度，至于社会上的其他（利弊、舞弊）弊病，不胜枚举，现在全国绝大多数人民有所觉悟，民心背向，只是怒不能言。人民跟着它，遭受了多少劫难，多少苦难。现在熊精的天下快要满了，有童谣云：“王不像王尾巴长，四成幸运被水滴，十田交了八丘粮，熊精二十八笔（必）亡。”

阁下若有智勇，成全大事，除却大害，拯救人民，拯救中国，定天下不难，我们当助一臂之力。否则，若苟且拖延，受它笼套，必为所害。前车是鉴，不可重蹈覆辙。

（引者按：以下是武文俊所谓“重新建党建国建军十大纲领”，其实有十一条，“三”为原文重复。）

若能成全大事，下面附有建国条例商讨：

一、中国进入资本主义不是复辟倒退，而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熊精的所谓“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社会奴隶主义，才是真正的复辟倒退。？

二、煽动鼓励人民之间斗争，说是阶级斗争，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它的奴隶主义制度。

三、国家应为社会契约产物，国家机构设中央、省（市）、县、乡、里等级，国家应民主产生，为全国大多数人服务（为勤劳、正直、善良的老百姓服务），国家机关的负责人员，应由人民逐级普选产生，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并且每四年一改选，连选可以连任，但最多只能连任三届（即12年）。

三、国家政策由人民讨论制订，逐级汇总上报中央，最后颁布确定。

四、建立一定军队，防御外敌侵略，建立少量地方治安，解决民事纠纷和刑事犯罪。军人来源由基层人民选送，服役期三年。愿继续服役者，根据情况加级加薪。

五、提倡言论、学术、出版自由，人民可以登报批评政府，提出建议，奖励科技和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材。

六、发展工农业生产。

七、财产问题，凡国有企业、工厂等仍为国家所有，集体财产仍为集体所有，给予奖励，不愿集体化者，由人民讨论，财产平均分配（但不予奖励），不许以强凌弱，侵犯他人财产和利益。

八、对原来干部、除少数确有作恶利（作）弊者外，其余一律不予追究。

九、国家征收的赋税，根据国家实际需要，稍有余地地来决定人民的负担（尽量精简机构、减轻负担）。

十、大赦天下，释放囚犯。

建国宗旨：创民主，除独裁，立自由，灭残暴，兴文明，破野蛮，建幸福，济贫穷，天下必群起而服之，定无反心。

知内者草

※ ※ ※ ※ ※ ※

今天看来，武文俊的信，对那个时代确实是反动的。至于“反动”得正确与否，1978年以来的中国改革本身已经做了回答。当然，武文俊也有失之偏颇、甚至以偏概全和泄私愤之处，但难道他应当就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吗？

判决书说武文俊“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这已是无须狡辩的。但说他“攻击我们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华主席”，无论怎样，也看不出这层意思。我倒觉得，武文俊在为“英明领袖华主席”设身处地着想，提请他注意“前车是鉴，不可重蹈覆辙”，“上台之时，须考虑下台之日”。同时还要华注意不要做“梦中的牺牲者”，因“曹操好梦中杀人，实际操刀不在梦中，被杀者在梦中也”……此情此意，实乃“谋士”

之状，又怎能说是“击攻”呢？相反，武文俊就是在华国锋上台后被“从重从快”镇压的。

人死不复生。武文俊冤死25年了，至今无人写过关于他的文字。也许，他太平凡了，他一介小学教员而已。是的，他1958年芷江师范毕业后几乎一直是小学教员（1970年至1973年曾在溆浦四中当过中学教员），并且是个不太听话的小学教员，1959年他要求调动工作，发牢骚，讲怪话，说“教师不能像板凳那样，放在那里就不能动”，不能调动就认为是“不自由”，因此，在学区挨过批判，写过检讨。1972年为了申请福利补助，他把自己家里写得很苦，“表现为不满现实”，又受到批判。但是，也正是他，在虚幻的“大好形势”下，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问题，说出了别人没有说、或者不敢说的真话——尽管他是匿名的，但被捕后，他坦承了全部事实。

审讯时问他写信的目的是什么，他说，“长期以来的阶级斗争抓得过死了。”并说写信“给中央领导，如果领导对结扎、民主、自由等问题能考虑一下更好，能否改革一下。”而那时的时代语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他却希望“改革一下”，当然与那个时代就格格不入了。

同事武思月说武文俊“有书呆子气”，我是相信的。不然，他不会一进监狱就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教诲感化了，并在“交待书”中一再诅咒自己“没良心”。他这样做，是想“从宽”，能活下去——既为自己，也为了孩子们。也许他想到了，假如自己死了，受苦的就是孩子们，因为“其父系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我镇压”的帽子会让他们永世抬不起头来。1976年7月30日上午在第三次庭审中，审讯者问他“打算怎么办”，他说“老老实实交待自己的罪恶，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如果党允许我再活下去的话，就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因为我的罪恶是死而有余，枪毙都还太轻了。我如能活下去的话，一定重新做人”。他还说，“我家四个孩子……还小，我爱人思想也很进步，她们都是革命的”。同年11月9日最后一次提审，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他说，“我请求政府给我一条生路。”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是毫不留情的。

武文俊永远在这个世界消失了。今天他之所以进入我的视野，是因为与自己的兴趣有关。或许，我还会写些关于他的文字，为武文俊，也为离我们还不太远的那一段历史。

~~~~~

## 【前事不忘】

只有先知道，才能不忘记

• 吕大渝 •

吃饭看报，看的是2001年6月14日星期四《人民日报》海外版。无意瞄到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令我苦笑，奈何不得。文章不大，一篇署名华梅的“服饰百年路”连载之八“乍暖还寒时候”。立意可以理解，通过1978年以来大陆百姓在服饰上的变化，旁证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带来的兴旺景象。这没错儿。但令我吃惊的那段说的是文革年间，响应“上山下乡”号召的“知青”回城探亲，“这时，首都有个‘联动’组织，成员均为高干子弟，因此统一穿著父辈的将校呢军服或是蓝呢子中山服，蓝色长裤下一双黑条绒面、黑人造革沿边、白塑料底的镶筋男鞋。”

如今，凡是五十岁上下的普通中国人，凡是经历过“文革”那场灾难和浩劫的普通中国人，或将范围更紧缩些，凡是现在五十岁上下、“文革”初期的北京市民，都会发现这篇短文在史实上太显而易见的时序颠倒。

“文革”初期“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就是到处抄家、焚书、砸商店招牌、剪“港裤”的瘦裤腿和女人的长头发时，斗争的目标是所谓出身不好的地、富、反、坏、右等“四类份子”及“牛鬼蛇神”。现在看来，这恐怕是“文革”发动群众的热身运动。而首当其冲被利用的，是由部份高干子女组成的“老红卫兵”们。这些中学生在1966年7月贴出的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为代表的血统论，是其行动纲领。他们把1966年8月命名为“红八月”，并喊出了“红色恐怖万岁”的口号。霎时间，中国大地公堂私设，屠杀野蛮，人命草菅，手段惨忍。而且，“红色恐怖”不只在8月，也不只在北京。

那段日子的北京，一到夜晚就阴森恐怖，入人自危。所谓出身不好或有些“历史问题”的中学校长、老师及普通市民，惨遭非人的酷刑与凌辱。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刑法和刑具，诸如浇、烫、烧、吊、踩、刺、跪、剃、磕响头、吃屎、喝尿、毒打、戏弄，纷纷出笼，名目繁多。其中，北京六中等学校为最。那时，不知有多少屈死者的冤魂游荡在恐怖血腥的“红八月”。令人费解的是，许多平日斯斯文文的女孩子，手执皮带，身着“国防绿”，疯狂得比男孩子还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是正值青春期，精力过剩而无处发泄的一群，即美国人所说的teenagers。再也没有比被冠以“革命”名义的“造反”更令他们感到刺激和体现自我价值的事了。

“联动”的武斗是在“文革”初期的事情。因为它造成的恐怖，连我都留下了清晰难忘的记忆，更何况本人就是受难者，或亲人就是死于非命的人们呢？

我记得，通亮的汽灯，是武斗的夜晚不可缺少的。我那时所住的中央广播事业局新302宿舍楼下的大院里，也发生过挑灯夜斗所谓“地主”和“地主婆”的事情发生。而那些吓得魂飞魄散的老头儿和老太太，不过是局里同事年迈的父母而已，有的还是熟人。我那时才20岁出头，值晚班回宿舍，正好碰上那些惶惶然的老人被打得鬼哭狼嚎，惨不忍睹之时，吓得我逃回宿舍，不敢围观。

我对汽灯的印象特别深刻。不只35年前广播局新302宿舍批斗“牛鬼蛇神”的那个夜晚，用了那种灯火通明的汽灯，1958年在女12中初中部公理会教堂前的操场上“大炼钢铁”时，用的也是那种汽灯，后来在人民公社“深翻土地”和吃“大锅饭”时，每到夜晚，用的还是那种汽灯，1964年“四清”召开社员大会，用的仍是那种汽灯。由此我知道，每到“运动了”的时候都少不了汽灯。这些年我常会想，1957年“反右”时，是不是也用过这种汽灯，那时我还小，无从知道。特别是在我还没有出生的1942年“延安整风”斗王实味们时，是不是就已经有这种汽灯了，我更无从知道。

说起“文革”伊始的那段历史，我们绝不应该忘记一个人，学生出身的遇罗克。他在文革初期“红色恐怖”肆虐的严峻时刻，撰写了颇有见地的《出身论》，高高地举起了批判“血统论”的大旗。遇罗克为此于1968年1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了死刑。1970年遇罗克被枪决时，是位才仅仅二十七岁的青年工人。”文革“结束，他妹妹遇罗锦的一篇《一个冬天的童话》读得我沧然涕下。

“乍暖还寒时候”那篇短文中所说的“联动”，就是由血统论的狂热支持者，北京东城、西城、海淀等各中学高干子弟组成的纠察队，也就是当时有名的“东纠”、“西纠”和“海纠”等在1966年底纠集而成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各“纠”及“联动”很快就被“中央文革小组”定性为“反动组织”，寿命并不长。

他们的寿命怎么能长？文革，是毛泽东对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力之争，“联动”成员的父母，13级以上的高干，都是大大小小的“刘少奇”，随即

将成为“革命”对象，“中央文革”怎能久留他们的后代，那些“自来红”的“联动”份子呢？

自然，后来被利用的另一批“红卫兵小将”，那些真以为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干了好些日子“革命”的中学生们，在刘少奇、邓小平的“刘邓路线”，以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位“彭罗陆杨”，已经被“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以后，自然也无久留北京等城市的实用价值了，于是，不得不“响应”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了。那些日子北京火车站车上和车下的哭喊声响成一片。后来在知青中广为流传的诗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写的就是北京火车站送行的情景。我的妹妹就是在1968年去东北嫩江插队的“老三届”知青。

综上所述，就连当年我这20来岁的北京小百姓，都准确无误地知道“知青”是在“联动”瓦解、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发表以后才产生的群体。而回城探亲，则更无疑是在那整整一代青年人有了一段“知青”资历之后才会发生的事情了。如此，怎么能如文中所说，在“知青”回城探亲时首都还有个“联动”组织存在呢？

其实，我何苦跟一篇议论穿衣服的小文章较劲？只因为“文革”至今不过才35年。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重大的事件，它的经验和教训，应该是我们这个历尽苦难的民族，在付出惨痛代价之后拥有的财富。就像南京大屠杀一样，就像奥斯威辛、格罗斯·罗森等集中营屠杀犹太人一样，文革中“联动”的“红色恐怖”，同样是20世纪的人间悲剧。“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了警告人类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历史不该被遗忘，不该被混淆。

虽然那篇“乍暖还寒时候”短文中的错误一目了然，但错误原因可以理解。这篇短文中说：“我同事的母亲曾留下一张着江青服的照片，师徒三人的服饰形像几乎一样。”我依此主观判断，作者不会超过三十岁，不可能有“文革”初期那段生活经历。

但是，仅仅35年前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而且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历史事件，对于刚“而立”之年的中国青年一代，竟已遥不可及、模糊不清了吗？这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

中国的老话说“吃一堑长一智”。一个健忘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我们不健忘。但是，只有先“知道”，才能不“忘记”。得让年轻人知道才是。

□ 写于2001年6月22日

~~~~~

【史海钩沉】

红卫兵领袖政治哲学的一个范例

• 木 华 •

古有三十六计，今有“三十六条权经”。前者是中国古代兵家韬略之精华，后者为“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期间红卫兵领袖的权术之“荟萃”。

“三十六条权经”（附于本文后）是当年在北京乃至中国显赫一时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第一号人物蒯大富个人的演讲“作品”，又可谓以蒯为代表的那一代红卫兵领袖们集体的历史“创作”。说它是个人的“作品”，因为它是由蒯大富于1968年2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举办的北京许多高校群众两派头目参加的大联合学习班上宣讲的。蒯大富本人并未正式出版发表过任何有关这类“权经”，他当时以个人的总结和认识来向学习班里的战友们介绍自己参加“文革”政

治斗争的经验或体会。蒯大富本人没有也不会去冠之以“权经”之类的题目。当时，它也被称之为“掌权三十六条”，还出现了“掌权三十条”的简抄本。说它是集体“创作”，因为它一经蒯大富之口说出，它就不属于蒯大富个人所有了。经过当时学习班的战友们记录、转抄、整理或编辑而在北京一些高校群众组织及其干部当中流传。

“经”者，乃经典、信条、准则也。“三十六条权经”在当时很多红卫兵青年学生中的反响，表明它至少反映了那一代红卫兵群众及其领袖的政治哲学。在蒯大富失落前，此权经受到褒贬不同的评价；在蒯大富失落后，它成为蒯大富的罪状之一。1970年9月，清华大学当时主要负责人迟群在全校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大会上，对此权经的部份内容痛加批判，斥责权经是“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政客的东西”。若是如此，还应补充的是：此权经也是“文革牌”的政客的东西。

—

“三十六条权经”的主题实际上是如何在政治斗争中团结大多数群众、争取反对派。这两方面在“文革”尤其在“文革”初期成为群众运动中至关重要的两个问题。正如此权经所说的，不仅两大派的群众“在最高权力机构中都能肯定找到代表人物”，而且团结中间群众“也是掌好权的重要标志”。检验“当权派的正确与否，就看中间群众能否接受”。当权派应该而且“必须使本单位大多数群众放心”，使不同群众的利益得到反映。

显然，蒯大富及其派别就是“文革”中崛起的群众组织的代表之一。“文革”初期，一些群众的普遍心绪是乱世争雄，既然你能拉帮结伙，造反起家，那我为什么不能另立山头，一比高低。“文革”初期给不同阶层的群众诉诸自己的利益和争取实现自己的要求提供了一个直接而又难得的机会。随着时间的发展，群众组织与群众组织之间的以及群众组织内部的张力比起它们同非群众组织的来，更加微妙，也更加重要。这些群众组织及其领袖既无稳固的权威根基，也无雄厚的权力力量，而不得不把与异己的群众组织的整个关系当成自己命运的“主旋律”。这也就使反对派问题油然而生。因此，团结大多数群众问题和争取反对派（包括中间派）的问题也是“文革”初期群众运动中的一对孪生问题。

“三十六条权经”强调，为了不因垄断而垮台，必须设置并保护反对派，但不要树过多的反对派。同时，还要善于处理众多的山头或派别。关于保护有代表性的人物，“多保一个问题不大，少保一个不得了”，对待反对派所采取的全部策略实质上都是为了掌权者自己。但是，这种反对派远远不是那种国家政治或党派政治或社区政治中相对于执政者而言的在野的反对派，它只不过是“文革”特定历史时期与其对立的群众组织“同生死、共命运”的任一群众组织，亦即非政治党派的群众组织。这种所谓的反对派在“文革”中更常见的是被称之为“对立面”。总而言之，群众问题，包括造反夺权、反对派、群众武斗乃至社会化的个人迷信等问题，是“文革”最广泛、最深刻、最重要的问题。也正是由于群众问题，对整个“文革”的研究才变成无比复杂的问题。任何关于“文革”的研究，都应切实地把群众问题置于基础性的地位，因为群众问题在其规模上和在其影响上不仅使“文革”成为20世纪数一数二的群众运动，而且成为“中国政治中永恒的话题”！（1）。在此意义上，不难看出，“三十六条权经”由“出生”到“入死”的经历就寓于“文革”的群众问题之中！

“三十六条权经”的上述主题并不新鲜，因为，对于当年由造反起家并且分化的群众组织及其代表来说，他们十分熟悉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三大法宝的著述。他们把前两大法宝搬到文革之中，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进而砸了“文革”的“脚”！

二

“三十六条权经”是“文革”政治哲学的一种体现。这类政治哲学固然有传统政治哲学的渊源，也有其生长并泛滥的现实土壤，然而，不同于其他所有的政治哲学，这类政治哲学具有自己的理论与实践之关系的独特方面：

一是理论“先于”实践。“文革”时期“思想先行”、“理论引路”表明：“文革”政治哲学的理论总是在时间上先于实践或“先验”地构架自己实践的运作和进程。这种“先于”往往是以理论去杜撰或虚设某种实践，往往是以理论的炫耀、夸张和吹嘘来预演甚至掩饰实践的浅薄、空泛和荒唐。这种理论既可侈谈“天言”、宣讲“天意”，更会与自己的实践相距天壤。在“文革”的历史现实中，这种理论不但无中生有、无事生非而兴风作浪，而且以言为绳、以笔为刀而所向披靡。相对于实践，这种理论的过于“成熟”和“发达”必然导致丧失其真实性的品格。

二是实践“反对”理论。“文革”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几乎在其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不是证明而是“证伪”了这种理论，即实践不是肯定而是否定了理论。实践“反对”理论，在使理论急剧多变而谬误百出的同时，也决定了理论的命运和归宿。“文革”政治哲学表明：这种理论从未在实践之中显示出来自己的完整，而更多的是支离破碎；从未在实践之中获得自己的稳定，而常常是分解变质；从未在实践之中开辟出自己的新生，而是趋向于衰落失败。例如，就当年被称之为“文革”开路而表示出上述理论与实践之关系的“大批判”来讲，它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批判，但却是一种“实践批判”，主要表现为：1、“肉体的批判”和人格的摧残；2、私愤的发泄或诅咒；3、“文革”理论的自行否定；4、某些批判者批判的专断和施虐；5、被批判对象的颠倒了再再现。这种“实践批判”从反面宣告这种理论本身就经不起任何自我批判。又如，“文革”理论把“革命”这一政治概念扩张为包括道德准则和价值规范在内的关于人及其一切的最高范畴，而“文革”实践恰恰告诉人们：正是这种“革命”最终“革”了“文革”的“命”！

三是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异化。纵观“文革”时期，理论与实践之关系几乎没有二者和谐共处的情况，而总是处于二元悖论的状态。例如，“提倡奴隶史观的人自己变成了英雄，群众运动变成了运动群众，上下级变成了‘猫鼠’关系，社会主义中国的政坛居然有人在讲‘政治贞操’——操纵别人命运的人有时也似乎身不由己，随意走出高墙半步也会有制度管着。”（2）“在‘文革’中，大民主摧垮了党内民主。群众权利践踏了群众自身在内的基本人权，玩忽了宪法还要制定宪法，民主在尴尬中战栗。问题的关键：有法而没有法的精神，体制吞噬了文化。”（3）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哲学像“文革”哲学这样处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全面冲突。“文革”政治哲学的理论和实践各自都是失范的（anomie），即失范的理论带动了失范的实践，失范的实践葬送了失范的理论。这大概就是“文革”政治哲学的特色所在。

“三十六条权经”仿佛为当时人们的掌权、用权制定了一系列规范、准则甚至注意事项。可是，此权经愈是在理论上详细、明确和深切，它就愈是在实践上难以操作或无法遵循。尽管此权经在“文革”的特定条件下显现出语言的朴实、观点的个性和功利的真切，但是它所体现出的政治哲学及其影响，给后人留下无穷的反思和难以言尽的评说。

三

有没有政治道德？具体言之，有没有“文革”政治道德？尽管“三十六条权经”本身没有去界定，尽管人们会有不同的解说，但是，此权经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今受到争议最大和否定最多的是它把政治当成无良心的或非道德的。这与其说“三十六条权经”道出了政治圈内的人们所忌讳的咒语，不如说它直陈“文革”政治领域中屡见不鲜的普遍现象和历史事实。例如，

在当年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领导层中非常流行来自中共中央“文革小组”有关头目的“政治斗争理论”：“政治斗争就是引导对方犯错误，政治斗争就是要结成死党，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然而，我们并不由引此而苟同权经的勇气和洞见。所谓“在政治上只有头脑而没有良心”，完全可改换成马基雅维里式的“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为了统治不计道德”的君主政治哲学的信条。“善于用间接的手段，达到直接的目的”，在特定的条件下，则往往有可能使目的与手段置换，手段充斥为目的，目的沉沦为手段，甚至有可能使手段与目的相互异化。无论是手段反对目的，还是目的否定手段，都最终使如此的政治成为畸形的、短命的。

政治作为人的特定社会活动必然是有规范的活动，因而也必然具有非常规道德的政治道德。历史证明：“只有头脑而没有良心”的政治不过是一种非人道的政治。是的，“没有任何一种现存的伦理体系能够确立政治斗争的规范并规定政治家用以对付其对手的方式。根本不存在政治家在每一个别情况下机械地运用的普遍规则！道德的或传统的一切都依赖于时间、地点以及正确地估计形势的能力。正如在日常生活一样，在政治领域中，善与恶是混杂在一体的：善可以转化恶，恶也可以成为善的标准。政治家经常被迫运用原则上与其想要达到的目标相反的手段，而且，他为之奋斗的伟大思想中足以使他盲目到忘乎一切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对他来说似乎一切都是许可的。为了满足人类最深切的需要，如果他以人类最神圣的权力的名义而战，所有反对的人不就更少了吗？为什么还要对这种人予以人道的思考呢？自相矛盾的是，最人道的政治方案可能直接导致最残酷的政治实践。政治家必须在良心上权衡一下一种理想在其原先的纯洁性可能保持不受污损的程度。”〔4〕我们还要追加的是：政治家若为了某种政治而只要头脑不要良心，若为了以政治家自己的道德来代替、玩弄或牺牲绝大多数人的道德，甚至若以政治家本人的最后不道德来“换取”人类大同的道德乌托邦，那么，政治家应该切记：无论在头脑上还是在“良心”上，他们都必须权衡一下这种政治的价值以及这种政治的道德在其历史和其现实加以实践的可能性的程度。

四

在“文革”头两年，“三十六条权经”的作者或实行者们既没有团结住大多数群众（哪怕是本单位的），更没有争取到所谓反对派，最终由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而走向政治上的失败或消亡。今天看来，那一代红卫兵造反派领袖的全部政治活动的弊端之一在于：没有真正理解和解决政治的权力、权威与政治的价值之间的互动。

因为，尽管权力、权威对政治来说尤为重要并且显现价值，但是，价值才是政治的理想或目的。换言之，权力是政治的工具，权威是政治的外在的、可见的媒介，而价值才是政治的核心。不是政治的权力、权威决定政治的价值，而是政治的价值决定政治的权力、权威。一定政治的价值规定了这种政治依赖何者、反对何人、为了什么、实现什么等根本方面。用“文革”的术语来说，政治的价值要解决打倒谁？为了谁？谁掌权？谁被夺权等问题。“三十六条权经”的作者和实行者们几乎没有正视或反思过他们自己身体力行的政治所具有的价值，而是过多地停留在政治的权力、权威的层面上，极为热衷于追逐权力、权威，即一发不可收拾地从事夺权、争权和抢权。正如蒯大富当年所言：“真正的革命派，应该满脑子里想的是夺权，眼里看的是夺权，双手干的是夺权。”〔5〕这类革命造反派的哲学仿佛就是“政治算不了什么，夺权就是一切”它也可言之谓为夺权政治哲学。虽然历史已有了实际的答案，但从理论上，我们还是要问：这种夺权政治的价值何在？这种价值为什么使其相应的、曾横扫天下、红极一时的权力、权威只能走向它们的反面？这种价值为什么使这种夺权政治只能走向失败？这种价值自身为什么注定被否定、被摒弃？进而，政治的全部价值是否只在于夺权或者由权力、权威所充当呢？

对此，包括M·韦伯在内的一些20世纪的思想家做了某种回答：“那些献身于政治的人的全部悲剧在于，权力和价值在每一点上，在政治过程的每一阶段上，在政治通过可疑的道德手

段实现其理想方案的事实中，都是确定的和必然统一的。超越现状，同时就是适应在现状中起作用的状态。在最真实的意义上说，政治是一把双刃剑。政治道路的每一步都充满着陷阱、困境和荒谬。”〔6〕

五

“三十六条权经”的作者或实行者虽然是某种按中国文化所言的“知识分子”，但在“文革”特定条件下，他们几乎把注重政治角色、聚集政治功能和追求政治权威作为知识分子问题的全部内容。这种从政治去评判并处置知识分子的一切问题的做法，使我们今天解读此权经不得不思索那些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知识分子的学业、职责、精神操守等等。

由于其主题所限，整个“三十六条权经”只讲了“与其自己花很长时间去学一样本领，还不如去交一个精通这种本领的朋友”，仿佛是通过求教或结交有专长的朋友获得某种本领或知识，但目的不是在于仅仅占有而是充份利用这种本领或知识，亦即“多交多种朋友是当好权的重要因素”，不管是何所学、何所交、何所用，都是为了“当好权”，用好权。“文革”初期，一代红卫兵青年学生以及激进知识分子，既以刀与火的文字更用铁与血的行动，演出了一幕“读书造反论”、“读书夺权论”的历史之剧。“三十六条权经”就是这种“读书造反论”、“读书夺权论”的一个“文本”。无论是在其前流行的“读书做官论”，还是在其之后滥觞的“读书下乡论”、“读书无用论”、“读书下海论”、“读书经商论”，都与上述“读书造反论”、“读书夺权论”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历史关系。甚至那种还不成熟的或不成型的“某某读书论”也与“读书造反论”、“读书夺权论”之间有着可探寻、可比较的联系。这里，历史上反反复复提出而又反反复复追寻解答的问题在于：对于整个中国知识分子以及青年学生而言，什么是“读书”？为了什么“读书”？如何“读书”？“读书”是“致用”还是“致知”？……简言之，知识分子以及青年学生的安身立命之地在哪里呢？近年来，一些学者就清华大学学生“读书”、学科建设等提出的真知灼见，再次使我们不得不正视上述问题。从曾昭奋先生的《清华园里可读书》〔7〕到资中筠女士《清华园里曾读书》〔8〕，再到张卫民先生的《清华北大：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窗口》和贺承军先生的《清华园里口读书》〔9〕，它们引起一系列不仅仅限于清华大学的、非常值得我们去深思和探讨的问题：在高等教育中，如何把握“工具理性”与“批判理性”的关系？如何解决人文精神的操守、不断健全与行为价值的奉行、不断修正之关系？在理工科大学中如何倡导和发展人文学科，以及在争取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学中应具备或如何创建世界一流的人文、社会科学？进而言之，在知识分子那里，“匹夫之责”与“学问术业”到底是何种关系？是治学，还是治世？是以治学来治世，还是以治世来治学？是以治学之际的治世而“兴”治学，还是以治学之际的治世而“误”治学？或者，以现代化的观点来讲，从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地位暂居“中心化”和常居“边缘化”这二者的互动中，如何使知识分子不断实现自我独立和自我完善呢？

今天，对于上述所有问题的解答，我们都应该把“三十六条权经”作为一个历史参照点。因为，此权经是“文革”时期以造反夺权起家发迹的知识分子的一幅自画像，也是这种完全政治化了的知识分子的命运的自供状（参见第36条）。在“文革”期间，几乎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像“三十六条权经”这样袒露出这种知识分子的以及“文革”中某些人的政治心态、政治权谋和政治情操。更为令人注意的是，“三十六条权经”集中体现并散发出这种知识分子的政治实用主义和政治机会主义的浓厚气息。也正是由于它们，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这种知识分子必然陷于人格分裂而最终丧失了知识分子自身的价值取向。

毋庸置疑，“三十六条权经”为我们考察和研究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知识分子问题，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历史“棱镜”。自宣讲之后不到半年，“三十六条权经”就在1968年4月至7月震动全国的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中遭到彻底的破产。有许多理由可以说，“三十六条权经”是被“文革”最高领导——“无产阶级司令部”所斥责的红卫兵领袖的“多中心论”在理论上

的体现。因为，权经不仅从思想容易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威，而且在实际中影响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中心地位。例如，1968年*月*日，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时，向井冈山兵团人员宣讲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制止武斗的指示，有关人员拒绝停止武斗，回答说：“我们不知道有毛主席的这一最新指示，我们只听蒯司令的，”这种“多中心论”自然要受到否定和批判。《人民日报》在1968年8月5日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两周年的社论中说：“所谓‘多中心论’是一种资产阶级山头主义、个人主义的反动理论。它涣散革命队伍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妨碍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倘若各个部门、各个单位都要‘以我为中心’，全国有许多个‘中心’，仍旧是无中心。这种思想如果听任发展下去而不加以纠正，就会走到脱离以至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错误的道路上去。”

《人民日报》在同年8月13日转载《解放日报》《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社论的编者按中，强调批判“多中心论”关系到“要不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所以，“三十六条权经”应在“文革”文献资料中占有一席之地，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注释：

- (1) 王绍光：《拓展文革研究的视野》，《二十一世纪》，1995年10月号，第31期，香港。
- (2)、(3) 张鸣等主编：《“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思》，第129页、第166页，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4年。
- (4)、(6) 米哈依洛·尤里奇著、郑一明等译：《政治的人》，载马尔科维奇等主编的《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第138—139页、第137页，重庆出版社，1994年。
- (5) 《井冈山》报，1967年1月17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主办。
- (7)、(8) 《读书》，1994年第7期；1995年第1期，北京。
- (9) 《中国青年研究》，1996年第1期，北京。

◇ 附：蒯大富的“三十六条权经”

- 1，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
- 2，要想反复辟就必须改造世界观。我们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被别人搞垮；第二种是自己的世界观没改造好，垮掉了，这太可惜了，太痛心了。
- 3，掌权者要学会团结中间群众，要使中间群众有饭吃，能说话。我们能否团结中间群众，也是掌好权的重要标志。
- 4，必须学会在权力机构中设置反对派，要保护反对派，因为垄断为垮台制造条件。
- 5，最高当权派必须学会保护广大下级干部和群众，尤其是犯过错误的要保护，不要随便踢，要拼命多保人，对战友立功的人更要保，有代表性的人物（如政治代表、群众代表等）要重点保护。多保一个问题不大，少保一个不得了。
- 6，凡群众中分成两大派的，在最高权力机构中都肯定能找到代表人物。
- 7，主要领导人要特别谨慎，不要说别人坏话，小节要注意。
- 8，要诚心实意待人。
- 9，在人民内部切不可树敌太多，以防别人联合起来将你打倒。
- 10，当权派的正确与否，就看中间群众能否接受。
- 11，好心人的糖衣炮弹最可怕，来自同志和战友的吹捧最可怕。
- 12，只有当你最困难的时候，你才知道有多少朋友。
- 13，要敢于承担责任，不许互相埋怨，职务越高者越要承担责任。
- 14，有志者立长志，无志者常立志。
- 15，胸怀远大目标，坚定不移地向前走，在命运的道路上碰得头破血流也决不回头。
- 16，对当权派周围的人，必须提倡为人民立新功，否则他们是位高而无功，俸厚而无劳，当

权派一倒，他们也就倒了。

17，“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必须进行长时间的积蓄力量，在这段时间内，不要由于自己的不慎重而被人搞垮。

18，今日山头之争，几十年后可能就发展为阶级之争。因此，今天必须正确处理多种山头之间的关系。

19，夹起尾巴做人是我们的座右铭，孔子曰：“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要多想，多看，多总结，少发表意见，尤其是不成熟的意见。风头主义卑鄙可怕，要少说话，多干事。

20，要有赏有罚、赏罚分明，以赏为主。

21，领导者说话要算数，允诺要实现。

22，要谦虚。

23，不够格就知趣点主动下台，硬赖在台上，总有一天会被臭哄哄地赶下去。

24，准备走曲折的路，善于用间接的手段，达到直接的目的。迂回是建立在明确的政治目标上。

25，敌人会利用我们犯错误而突破缺口，来向我们进攻。

26，当权者最容易背包袱，尤其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干下去。所以，当权者往往是很蠢的。因此，主席提出要换地方闹革命，我们也应换地方闹革命。

27，与其自己花很长时间去学一样本领，还不如去交一个精通这种本领的朋友。

28，要多交多种朋友是当好权的重要因素。

29，要善于利用革命高潮时，把革命推向新阶段，使长时间的量变产生飞跃。在这种关键时刻，切不可糊涂起来，要有气魄、有胆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十月革命时就是这样）。

30，山崩于前不变色，遭到突然事变，大规模袭击时，不要惊慌失措，要冷静下来，迅速调查，分析事物本质，以采取相应措施。

31，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必须选择在适当时间给以毁灭性的打击，能现在消灭的就不要等将来。在政治上只有头脑而没有良心，菩萨心肠在阶级斗争中站不住脚。

32，政治威信和组织手段是稳固政权的两大重要因素，要加强组织手段，即健全机构、清理坏人。

33，当处于形势大好、战略进攻时要分权，即要放手发动群众；当战略退却时，要大胆果断、高度集权，此时极端民主化会毁掉自己。

34，一个单位的掌权者，必须使本单位大多数群众放心，多阶层、多团体的利益都必须在权力机构里得到反映，按功过大小，在权力机构中有一定的地位和荣誉，多得多。

35，领导核心要善于调节多山头之间的不平衡，不能压。

36，得到政权后就得运用，而且不容得稍稍犹豫，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 11 / 18 / 2002

~~~~~

## 【学术争鸣】

### 文化革命中造反运动及造反派之评析（二之一）

——为文革三十五周年而作

• 刘国凯 •

#### 一，引言

对中国当代史上最大的事件——文化革命进行评判绝对不可能撇开对文革造反运动和造反派的研究评述。而从中共官方及其御用文人到自由派知识分子乃至部份民运人士都对文化革命中的造反运动和造反派持完全负面的评价。

我从来认为文革造反运动与民主运动、文革造反派与民主运动参加者都有着极大的乃至质的差别。但我又绝不赞同对那种完全否定文革造反运动和文革造反派的观点。我洞悉中共官方的“否定”是出于卑劣的政治动机。我推测自由派知识分子和部份民运人士的“否定”是由于对史实缺乏足够的了解。

从许多文章著述中我发现“否定”大多建筑在这样几个基础上：一是时空混乱。把造反派尚未产生之前和造反派已不复存在之后的一些社会恶质事件说成是造反派的所为。二是移花接木乃至栽赃诬陷。把保权派组织（即保皇派、保守派，）所作的坏事“如红色恐怖运动”都说成是造反派作的。三是基本判别失误。否认文化革命中的群众组织有造反派和保权派（保皇派、保守派）之分，认为所有的群众组织都是造反派组织从而使其评判走入迷途。

我以前所撰的“文化革命简析”、“广州红旗派的兴亡”等一类著述重于写史，其作用在于让人了解文革的基本形态和过程。这虽然甚有必要，但从辩明某些观点上来看，其效力则觉不足，故现拟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对文革造反进行概括性剖析，以期对文革造反的评判这一甚具争议性的问题注入新血。

## 二，微观分析——文革时期造反个体动机之分类

### （一）聂元梓类“造反”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了后来被毛泽东极力称赞的“第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的题目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内容是严厉指责北京大学党委压制师生起来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行动，字里行间暗示宋、陆等人也是黑帮。尽管那时造反一词还未出现，但聂元梓等人的行动毫无疑问是文革造反运动的先声。然而，这算是什么造反？人们记得，9年前北京的大学校园中也卷起过浪潮。林希翎、谭天荣等一批青年学生贴出大字报针砭时政，抨击现行政治制度缺乏民主，揭露共产党领导干部已形成官僚特权阶层，生产资料所有制正在蜕变为官僚所有制。事情的结局是，这些青年学生都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受到严厉的惩罚。9年后聂元梓们的行动与之大相径庭。聂元梓们非但不是抨击时政不够民主，而是认为时政还不够专制。现实情形不是别人要把他们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是他们要把别人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中共大员力求把毛泽东发动批判运动限制在思想理论批判的范畴之内。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有二。一是出于一种温和心理，不忍心把批判的调子定得太高，以至导致严酷的政治惩罚。二是出于自保心理，担心批判的火头太旺，弄不好会烧到自己身上。在当时，刘邓们无疑是中共党内的温和派，毛泽东是极端派。人到中年，身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聂元梓及其追随者们揣摩毛的意向后，主动出击，不但要激烈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和“黑帮分子”（已倒台的中共高官）而且还要激烈批判现任温和派中共高官。如果从中国人“犯上作乱”的观念出发那当然应该把聂元梓们攻击校党委的行动定义为“造反”，但这样一来又该怎么评价他们的行为中满含迎合毛思想意图的实质呢？对于中共的最高统治者、中共政治制度的代表者——毛泽东来说。他们的行动非但不是造反，而且是维护和效力。因此，那样的分析显然会陷入自相矛盾之中。然而，如果把“造反”的定义另作诠释就可得到较清晰的解答，即造反是“于不同程度上对现存统治秩序施于的压迫、迫害所进行的反抗行动”。从这个定义上去考量，聂元梓们的行动就不是造反，因为他们根本不是现存统治秩序下的受压迫、受迫害者。并且，由于他们攻击的对象是统治集团中较温和的一翼，他们所取悦的、效力的是统治集团中最暴虐的一翼，故他们非但不是造反，而且是助纣为虐。

## （二）蒯大富类造反

聂元梓们的行动引起了中共温和派的愤怒。中共温和派的温和只是就其不赞同毛在党内和在思想理论界进行严厉的政治清洗而言，但一旦有人对他们的权威进行挑战，他们就决不再温和。他们立即派出工作组进驻各大专院校控制事态。聂元梓由于其行动已公开得到毛的肯定赞许，她那个小群体不至遭受什么惩治，而其它许多效尤者就厄运当头了。工作组动员组织力量对大专院校中所有擅自批判校党委和工作组的人进行围攻。火力所及，不但那些激进学生因其大胆妄为而自食其果，就连某些并无越轨行为的人们只因出身成份的问题也遭池鱼之灾。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少数学生敢于与工作组顶牛，蒯大富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事情的内在实质起了变化。1966年6、7月间蒯式人物的行动与5月底聂式人物的行动应作不同的解读。聂式人物是在没有受到压力的情况下采纯进攻性动作，蒯式人物则在面临将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学生的巨大政治压力下作以攻为守的困兽犹斗。聂式造反与蒯式造反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对中共最高层政治动态有所觉察者的政治投机、政治赌博，而后者只是一些少不更事者的政治躁动。

蒯式学生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和“黑帮”的“革命激情”固然乏善可陈，但这毕竟只是一种政治狂热而已，实际上并不能对那些被批判者作出惩治，而工作组对他们的批判就大不相同了。一旦被工作组定为“反动学生”，那九年前谭天荣们的下场将是前车之鉴。在这种情况下，除大多数的“激进学生”沮丧惊慌外，仍有极少数象蒯大富这样的倔强者坚持斗争。这“斗争”已不是去批判别人，而是极力争辩自己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学生。按照中共统治秩序的政治逻辑，“党”说谁反动谁就是反动，只能乖乖地俯首认罪等候惩处，不容丝毫辩解。象蒯大富这样敢于对工作组——党的领导在学校里的具体体现——进行抗拒，真是狂妄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应给予更严厉的惩罚。然而这也就恰恰说明了蒯大富们的反抗行动是对当时统治秩序的造反，从而与聂元梓们的政治行为有质的不同，

## （三）贵族红卫兵类“造反”

文化革命中“造反”一词首见于清华附中红卫兵三篇“论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中。从此造反一词贯串文革全过程。文革初期共产党高干子弟的“造反”狂潮举世皆惊。然而他们究竟造了些什么反呢？

由中共高干子弟组成的贵族红卫兵掀起了1966年8月的“红色恐怖运动”狂潮。“红色恐怖运动”发端于7月间的“破四旧”运动。文化革命给青少年学生最初注入的政治狂热是去破除社会生活中带有“封资修”意味的“旧”事物。从改街道名称、店铺名称到摧毁宗教庙宇历史文物再到干涉人们的服饰和发式，整个气氛在迅速升级之中。“破四旧运动”是所有学生都有资格去参加的，除非是有些学生出于性格上的内向或认识上的差别没有去或不愿去参与。

8月，气氛陡然剧变，从狂热急剧变成暴戾。如果说“破四旧”还有点胡闹、恶作剧的成份，那么“红色恐怖运动”就完全是惨无人道的暴行。以抄家、打人至任意把人殴打至死的“红色恐怖运动”不再是所有学生都有资格参加，只有“红卫兵”才有资格参加。加入“红卫兵”有严格的政治条件，就是必须是“红五类”出身。（革军、革干、工人、贫农、下中农）但是，在红卫兵组织中真正起作用、居领导地位并最敢于、最有兴致把人打死的是“革军、革干”子女。被施暴的对象从“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延至“反动文人”、和有各种政治“问题”的校长老师，直至出身“不好”的同学。

以中共高干子女为主体组成的贵族红卫兵是压迫者、迫害者。他们有什么反可造？他们实



施“红色恐怖运动”的根据是，当年他们的父辈“闹革命”时曾遭受“白色恐怖”的迫害，所以他们现在就要“造”这些“反动分子”的反，还以他们一个“红色恐怖”。因此，“红色恐怖运动”绝对不是受压迫对压迫者的造反，而是压迫者在法律上被剥夺了反抗权利的被压迫者的施暴，是严酷的政治歧视、政治迫害和残暴的人身虐杀。

#### （四）平民红卫兵类造反

一度极受毛泽东宠爱的贵族红卫兵到1966年秋就失宠了。原因是他们的父辈属于毛的清洗对象或与毛的意见不合，而他们因不忿父辈的失势遂产生对毛体系的对抗情绪，以至在毛体系眼中失去政治利用价值。这时另一派红卫兵崛起了。这就是平民红卫兵，其直接来源是1966年6、7月间受过压制的蒯式学生，它在加入条件上取消了出身成份的限制。声称只要忠实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都可以参加。同时，它还对贵族红卫兵所狂热鼓吹的血统论进行了批判。

平民红卫兵在名称上都与贵族红卫兵有显著区别。贵族红卫兵多只叫“红卫兵”，或加上个前缀，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平民红卫兵虽也统称为红卫兵，但其组织名称则是多样化的，如“红旗”、“东方红”、“井冈山”等等。

如果说贵族红卫兵与毛体系的蜜月十分短暂，只有两个月左右，那么平民红卫兵就幸运一些。它从产生到被压制大约有二十个月的过程。（当然从更广阔的历史场景上去考察，贵族红卫兵终究是赢家，他们是八、九十年代中共第三、第四梯队的主要人选，而平民红卫兵的蒯式人物则始终被排斥在社会边缘，有的甚至系狱多年。）在二十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平民红卫兵究竟做了些什么呢？

平民红卫兵能够存在这么长的时间，固然说明了它的一些行动符合毛体系的需要，而它终究被压制，又说明它的另一些行动越出了毛体系的规范。

平民红卫兵符合毛体系需要的行动是他们把“造反”矛头指向毛体系欲清洗的人物，即为毛的政治清洗服务，“批判”、批斗了刘少奇等一大批中共高干。越出规范的行动是它还把矛头指向了许多并不属于毛要清洗的高干。干扰了毛的战略部署。甚至对共产党的政治秩序产生了疑问和冲击。

平民红卫兵有其两重性，它充当毛体系政治清洗工具的那部份行为是乏善可陈的，而它越出毛规范的行动则应作别论，至于它的那些疑问和冲击则是它的光彩。

在评判平民红卫兵类造反行动时，除具体考察它的许多作为外还应考虑到它的阶级基因，舍此不可能对它做出正确的评判。平民红卫兵顾名思义其构成以平民子弟为主体。这一构成决定了它的成员不会是共产党统治秩序下的特权享有者，而其大多数还是这个秩序下不同程度的受侵害者。从具体的出身成份上来看，平民红卫兵中以工商个体劳动者、职员、知识分子等社会阶层的子弟为主体。工农子弟是分裂的。其中一部份惑于“红五类”虚幻的政治荣耀而与中共干部子弟结合。一部份则出于自身真实的感受和正义感而加入到平民红卫兵的行列。

中共干部子弟也是分裂的。文革初期他们几乎都是贵族红卫兵的一员，但随着运动的深入，许多中共高干受到冲击，这使其子弟的思想产生剧烈分化。一部份走向北京“联动”类。这一类强烈反中央文革、反江青林彪、甚至反毛。因为他们体认到其父辈的倒台，其贵族子弟身份的丧失盖因毛的权力清洗。与此同时他们又极为仇视所有的平民红卫兵，因为他们认为平民红卫兵是毛的政治打手。“联动”类有这样的看法和相应行为并无可厚非，但关键在于他们是站在

反人民的立场上。他们“反对”行动的出发点是维护其特权阶级利益。这一立场他们一直没有改变。直至二十年后他们为六四镇压叫好，今天则正在作为第四梯队走向权力的宫殿。一小部份中共高干子弟则走向了人民，加入到平民红卫兵之中。基于父辈若隐若现民主意识的影响，基于个人的品质和知识，父辈的失势不但没有使他们产生“联动”式狂怒，反而引发了他们深层的思索。

平民红卫兵的阶级基因决定了它的主要行为模式是“于不同程度上对现存统治秩序施予的压迫、迫害所进行的反抗行动。”也正因为这样，平民红卫兵终究在1968年7月以后遭到压制乃至镇压。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联动”分子尽管那等狂妄，但他们能得到毛泽东的原谅，邓小平的赏识提携，而平民红卫兵的头头则一直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 （五）王洪文类造反

王洪文是共产党员、转业军人、保卫干部。拥有当时的几面金字招牌。固然，由于其级别有限，未可进入中共特权阶层，但也决不是当时政治制度下的受压迫者。在一般情况下，拥有这些金字招牌的人非但无反可造，而且很顺理成章地成为保权派的骨干人物。然而，王洪文却做了大造反派，这是什么原因呢？

在共产党的政治体制中，拥有金字招牌的人数总是大于官员的数目，这就意味着有些拥有金字招牌的人将分摊不到官职，或分摊不到他认为自己应该分摊到的某级官职。除了这个基本原因外，还会有人事关系、派系倾轧等因素，这些因素和原因迭加在一起就会在许多地方和单位中产生一些拥有金字招牌却没有分得合其心意的官职而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当权派怀有不满乃至怨恨的人群。这些人就有可能在文革中投身到“造反”的行列之中。王洪文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人物。

我们把文革造反这一概念表述为：“于不同程度上对现存统治秩序施予的压迫、迫害所进行的反抗行动。”这“压迫”当系由制度所造成。由官职份配“不公”而造成某些拥有金字招牌的人物所感觉到的“受压迫”感，并非源于政治制度。所以，他们的“造反”已非真实意义上的造反。

#### （六）反抗类造反

反抗类造反广泛存在于工商企业和中、基层机关单位之中。是导致文革造反行动最典型、最广泛的动机。这是因为共产党的统治秩序主要是体现于这些地方，而不是体现在学校和较高层的机关中。文革前十七年，由于连续不断的运动整人，和各单位党政领导在此之中滋长起来专横跋扈的作风而积累了大量的干群矛盾。群众对单位党政领导普遍怀有不同程度的不满。

1964年—1967年我在广州郊区税务局做小税务助征员，1967年以后一直在广州有线电厂做工，藉此我直接观察到了机关、工厂里的群众为什么会有反抗类文革造反行动。

如：1964年广州市公安系统按上级指示把一批政治上不可靠（所谓出身不好或不靠组织之类）的公安干警调往其它非要害部门，其中一些调来税务局。文革造反浪潮起后，这些人串连起来到市公安局造反，说市公安局领导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他们进行了政治迫害。他们要求平反，要求回到公安局工作。尽管复职的要求没有实现，但他们也得以出了心中一口恶气。

又如1965年广州郊区税务局属下的黄埔税务所搞小四清，把三个平时比较接近，并常

讲怪话发牢骚与领导抬扛的税务干部打成反党小集团。其中一人精神上顶不住，跳楼自杀。文革造反开始后，这个“反党小集团”的两名幸存者坚决要求为他们，尤其为那位死去的同事平反。

再如，广州有线电厂文革前夕曾发现一张“反动标语”。厂领导怀疑是某位技术员写的。对他施加了很大的压力。由于的确没有证据，不了了之。文革浪涛起后，这位技术员成为厂里造反组织的头头。他痛恨厂领导对他的政治迫害。因为他心里明白，厂领导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千方百计地要把他打成书写反动标语的现行反革命，是因为他在工作上对领导的瞎指挥提了些意见。

除了这样一些较为尖锐的事例外，更经常、更大量的则是单位领导在日常工作、生产活动中欺压群众、打击报复。而最近期、最集中的矛盾是单位领导在1966年6、7月的第二次反右中迫害了许多群众。关于这些连毛都看得清楚。他对文化大革命中群众造反浪涛的产生作了这样的解释：“一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二是官作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爱摆架子，有事不与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

#### （七）张九龙类造反

张九龙是杨曦光1994年出版的一本著作“牛鬼蛇神录”里的一个真实人物。与张九龙类似的人物还有刘凤祥、侯湘风等。这些人基于其出身背景、个人经历、知识思想使之早在文革前夕已对共产党制度持根本否定态度。他们投身文革大波，参加造反派，尽力把造反之火烧旺。他们暗中串连，组建秘密组织，收集武器，准备在时机到来时大干一场，推翻共产党的政权。然而“时机”永远不会到来。毛洞察到造反派已有越轨失控的迹象。他及时煞车转向。张九龙们遂被“抛出”。1968年初局势稍呈掌控。当局就把形迹略露的张九龙们抓捕判以重刑，并在1970年一打三反的处决狂潮中把他们枪决。杨曦光的文革经历比许多人丰富得多。比如我在文革过程中就还没有亲身遇到过张九龙这样层次的人物。尽管我那时内心对共产党制度已基本持否定态度。

#### （八）争权类造反

以上分析的造反动机是原始动机，在运动发展过程中还嬗变衍生出了另一类造反动机，这就是争权类造反。

在各单位、各地党组织瘫痪，当权派们靠边站以后，社会公权力出现了某一程度的真空。这种情形当然不可持久。1967年初春毛提出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来重建共产党的权力系统。他决定在这“新生红色政权”中，军代表、原地方领导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各占三分之一，并由军代表居主导地位。于是这就展开了争夺那三分之一群众组织名额的激烈斗争。这类造反主要存在于各群众组织的头头和部份骨干之中。这里要注意的是：1）一部份热衷于这类造反行动的主要上是想作新官，以拥有政治权力为乐。这类大多从王洪文类造反中衍生而来。2）另一些则是想以获得某些政治权力来保证自己今后免受报复清算。这类大多从反抗类造反中导出。当然也会有些人是1）、2）两种动机都兼而有之的。

#### （九）杨曦光类造反

由于毛的新权力机构的设计实际上是恢复原有的共产党权力体系。军代表居权力要津。重

新起用的地方干部掌握实际事务，而群众组织代表则处于陪衬地位，这使一些造反者产生迷茫困惑乃至不满。既然到头来一切都基本恢复旧日的秩序，那何必当初又要我们民众起来造反打倒当权派？现在这些当权派大多都官复原职，我们这些批判过他们的群众今后岂有好日子过？在这种情势下，许多造反者都消极了，但有一些造反者却奋然开启了另一类卓绝的思维。他们没有去参与争夺那三分之一的群众组织的代表名额。他们不希求做新官，不寄托于以掌握部份政治权力来保证自己今后不受清算，而是从根本上否定毛的新权力结构设想。

他们相信“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建设一个美好的巴黎公社式的社会。但是他们又认为文化革命在1967年中以后有半途而废的危险。这是因为在军队干部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旧政府”的抵制下，“伟大统帅毛泽东……作了大幅度的退却”，不得不让百分之九十的旧官僚都复出。他们不能接受这种状况，他们要求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续向前推进。他们推崇巴黎公社民选行政长官的原则。他们指控中国已出现了一个与劳动人民利益相对立的特权阶层。

在不同程度上持有这类观点的有北京中学“四·三”派、清华“团派”、武汉“北决杨”、湖南“省无联”等，其中以湖南“省无联”观点表达得最为鲜明尖锐。长沙一中高二学生杨曦光所撰“中国向何处去”是“省无联”思想的代表作。

#### （十）结论

通过对以上九类造反动机的陈述，可知：

1、聂元梓类“造反”实质上是政治赌博。是主动充当更强有力的政治人物的打手去打击其效力对象所要打击的次强有力的政治人物，以获得政治封赏。

2、王洪文类“造反”实质上是政治投机。是想通过文革造反在共产党政治权力体系中取得自己原来想取得而未果的权力和地位。

3、贵族红卫兵类“造反”实质上是政治施暴，是血统“高贵”者对血统“低贱”的虐待残杀。

4、平民红卫兵的造反（蒯大富类造反纳入此类之中）具有两重性。它冲击中共高官系为毛的政治清洗火中取栗，这尽管谈不上造反，但也具有削弱中共统治机器的作用。至于它有限地批判了血统论，推动支持各地各单位的受迫害群众的反抗斗争，对抗施行1967年早春镇反的各地军方，这些都符合了“于不同程度上对现存统治秩序施予的压迫、迫害所进行的反抗行动”的“造反”定义。

5、反抗类造反是文革时期最广泛存在、最明确体现的造反行动。是文革造反的主体内容。它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其高端是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争取自身的应有权益，其低端是发泄对社会、对中共官员的不满，甚至对迫害过自己的共官进行报复。

6、张九龙类造反是当时高层次的造反。其目标甚至是要推翻共产党的政治统治。但这类造反不是文革造反的主流，而只潜流于文革造反的大浪之中。它不但受到中共统治机器的严厉镇压，也不为平民红卫兵造反者和反抗类造反者接受和认同。而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去回首眺望三十多年前张九龙这些先知先觉的悲壮之士，会觉得他们的事迹是何等的可歌可泣。

7、1）类争权造反虽无积极意义，但在客观上也给共产党秩序的重建以干扰。

8、2）类争权造反依然带有“于不同程度上对统治秩序所施予的压迫、迫害进行反抗”的意味。只是，它所反抗的不是当前的，而是今后可能加诸自己压迫和迫害。

9、杨曦光类造反是文革时期人民反抗运动的精华。“省无联”所推崇的民选行政长官的巴黎公社原则，和百分之九十的中共高干已形成特权阶层的论断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思想高峰，已直接突刺到共产党政治体制的根本，所以在1968年初——文化革命还没有结束，全面镇压还未展开之时，中共高层两派——以毛为代表的“文革派”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政府派”就联手对“省无联”进行了彻底镇压。“省无联”头头全被判重刑。23岁的张家政被判20年，19岁的杨曦光被判10年。两年之后的“一打三反”中，处决权曾下放省级。张、杨均已内定改判死刑，押回长沙准备执行枪决。幸此节骨眼上，中央又把处决权回收上去，张、杨等人得以逃过一死。

### 三、宏观分析之一：学生造反与工人、职员（机关干部）造反的区别

学生造反指的是平民红卫兵的造反。至于贵族红卫兵造“黑五类”“反的一类行动与原本意义上的文革造反风马牛不相及。故不在讨论之列。

#### （一）区别之一：学生造反时间的超前性。

学生造反行动始于1966年6、7月间蒯大富式的反工作组。应该看到反工作组与反校党委是在两个不同的层次上。自北大校党委垮台后，其连锁效应使其它校党委都在风雨飘摇之中，敢于反他们并不足为奇。而工作组就大不相同。它是党中央派来的。起初一般学生是绝对不会知道毛并不同意派工作组，在这种情况下竟敢与工作组顶牛，其胆量超过了9年前的谭天荣们。因为谭天荣们是在党“鼓励”的情况下鸣放，而蒯大富们则是在党（工作组）一再制止下还要放炮。并且，谭天荣们前无古人，而蒯大富们却已有谭天荣们的政治尸体为前车之鉴。

当然，蒯大富们的政治语言与谭天荣们大相径庭。谭天荣们是直指共产党制度，而蒯大富们却是在指责工作组包庇“黑帮”，阻碍革命。这固然使工作组难以立即把蒯大富们投入监狱，但按照共产党的逻辑——比革命还要革命的就是反革命。如无后来运动的大转向，蒯大富们的下场当不比谭天荣们美好。

蒯大富们的造反行动为贵族红卫兵八、九月的“红色恐怖”狂飙所中断，至10月在毛中央的支撑下重新举起造反大旗。其矛头所指，一是贵族红卫兵的血统论，二是各级当权派执行刘、邓把大量无辜群众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就是在这个浪潮中，平民红卫兵在全国范围里广泛形成，并迅速膨胀成极大的势力。它除自身扩展外还到工矿企业中串连。应该说，在相当程度是由于他们的策动和鼓动，工人的造反行动才得以发生，工人造反派才得以形成。这时已是1966年11—12月。

故学生造反比工人造反几乎超前了半年。

#### （二）区别之二：学生造反动机的单纯性

1966—1968年间，无论是20岁以下中学生还是20—25岁的大学生其绝大多数的造反动机都是为了革命，为了忠于毛主席，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即使象杨曦光这样以推崇巴黎公社原则而伤及中共政权根本的风毛麟角的人物，照样是满口的“忠于”。（这表面事实的背后到底是策略还是真实，只有杨曦光本人才能答复）这就是说，在学生造反的原

动力中充满着意识形态的色彩。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有二。

（1）文革前中共政权在学校里的厉行洗脑，使绝大多数各个阶级出身的学生都对毛顶礼膜拜。而在批判“资反线”后，（有限度地批判血统论是批判资反线的重要内容）在城市大中学校中占较大比重的非红非黑类出身的乃至一些“黑五类”出身的学生对毛更加是感恩涕零。因为全靠有了这个批判才解除了（暂时解除，1968年中“清理阶级队伍”以后，血统论全面回潮）扣在他们头上的政治种性紧箍咒，使之重新获得政治人格，得以名正言顺扬眉吐气地参与社会政治活动。这自然会促使他们在此后的行动中处处以维护、捍卫毛和毛路线为己任，处处以毛的忠实卫兵自居。

（2）学生的生活环境单一。学校不是共产党统治秩序典型体现的地方。学校里学生与教师的关系与工厂机关里的工人、职员与共产党领导干部之间那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有很大不同。学校里当然也有斗争。从评先进得奖状的虚名到拿助学金和毕业分配等实际利益，都会使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产生积累着种种矛盾。但是这与工厂、机关相比还实在是太简单。工厂机关里有工资晋升问题、工作工种分配调动问题、奖金评定问题、生活困难补助问题、宿舍分配问题、生产技术与行政权力的冲突问题……。当然更为尖锐的还是工厂机关里在连年的整人政治运动中制造积累了大量人与人之间的猜忌、戒备乃至仇恨。

学生造反动机单纯性的也恰恰相对地说明了工人职员造反动机的复杂性。上面所列举的那么多问题在平时不能得到解决，遂都在文革中直接地或间接地表露爆发出来。这就构成了文革造反中最广泛、典型的反抗类造反。更何况在文革中还有相当数量的王洪文类造反，和少数张九龙类造反。这就使工人职员的造反尤呈复杂。

### （三）区别之三：学生造反场所的社会性

学生造反派活动的场所主要在社会上，这是因为学校里已无事可做，而且在社会上到处冲撞撞这才最符合青年人的特点和爱好。

学校里的党组织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就全垮了。共产党对此并不怎么紧张。因为学校的党组织与工厂机关里的不同，它还算不上是政权的延伸，而工厂机关里的党组织则带有鲜明的政权性质。学校不用上课，校领导和老师权威为零。何况部份教师也成立了群众组织投入文革浪涛了。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将其主要精力投入社会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学生们到一些工厂机关里去串连，鼓动工人职员们起来造反。支持他们批判本单位党领导在前阶段执行刘邓“资反线”把无辜群众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罪行。在工人职员还有些犹豫不决、心存顾忌时，学生们冲上台去责令当权派低头向群众陪礼道歉。这就一下把当权派昔日的威风打掉了许多。学生们甚至还鼓动有些单位的工人职员造反派去冲击本单位的党委办公室、政治部或保卫科。他们告诉工人职员，当权派最喜欢把整群众的黑材料藏在这些地方。

当然，学生们更感兴趣的还是炮轰各地省市党委。指控他们是刘邓司令部里的人，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了集合更大的造反力量，学生造反派还努力促使工人职员的跨单位、跨行业、跨地区的大型造反组织的成立，并联合这些组织去冲击省市党委。

毫无疑问，学生造反派的这些做法在文革初期虽受到一些工人职员的欢迎，但也受到更多工厂机关里的政治红人乃至一些身份普通但思想行为比较守旧的人们的反对。这就发生了1966年秋许多地方的工人市民围攻学生的事件。

随着运动的延伸，一波又一波，从1967年的一月夺权到二、三月的早春镇反，再到1967年的暮春平反和夏季大武斗，学生造反派的活动场所愈来愈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横断面，以至最后毛在它的政治清洗目的已经基本达到后欲结束文革局面时，不得不在1968年夏末采取强制手段，指令“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学校，并把六届高初中生和四届大学生一起毕业分配赶到工厂农村，以结束主要是由学生造成的文革局势。

工人职员造反派的活动场所既在单位内也在社会上。这是因为单位内原有统治秩序仍然存在。当权派和保当权派的另一派群众组织仍有一定的甚至很大的势力，这一势力威胁着它的存在，所以它必须在单位内与之缠斗。而社会上的文革形势与单位内的息息相关，这使它又必须投入社会，以取得社会上的支持来对抗本单位的保权派。

（未完待续）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吕青（加拿大）     | 熊波（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